

鴉片戰爭在閩台

史料選編



鴉片戰爭在閩台

史料選編

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

福建地方史研究室

編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2659/30 up

鸦片战争在闽、台史料选编

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
福建地方史研究室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3.75印张 4 插页 322千字

1982年10月第1版

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书号: 11173·68 定价: 1.5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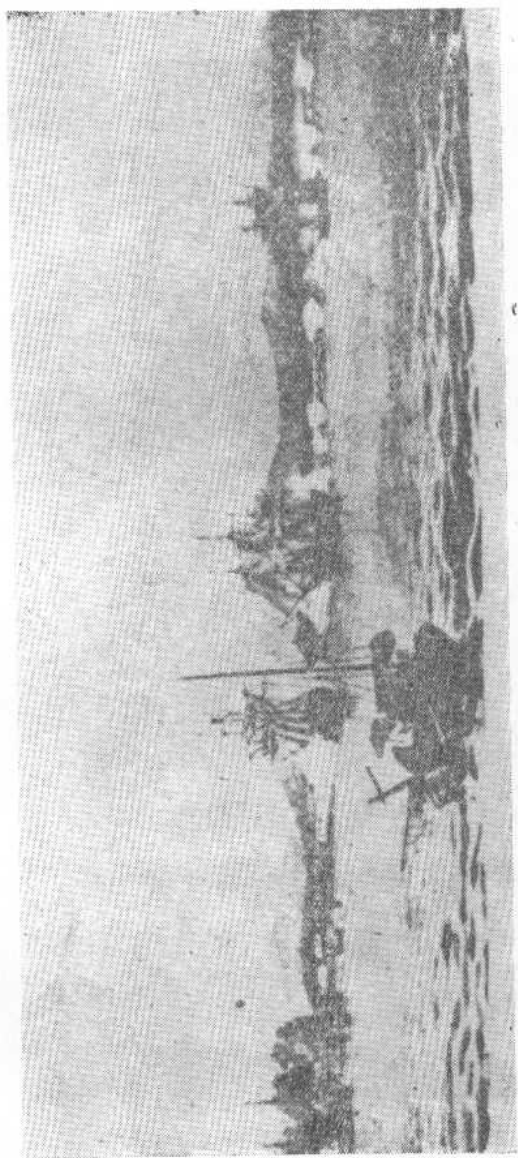
2659/30



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（1785—1850）

——福州市文管会收藏

1227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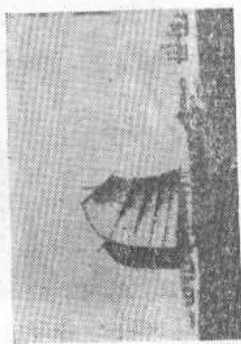


1841年8月26日，英舰侵占厦门。

——采自蒲廉一：《世界历史大系：东洋近世史
第一篇》

英国装运鸦片的走私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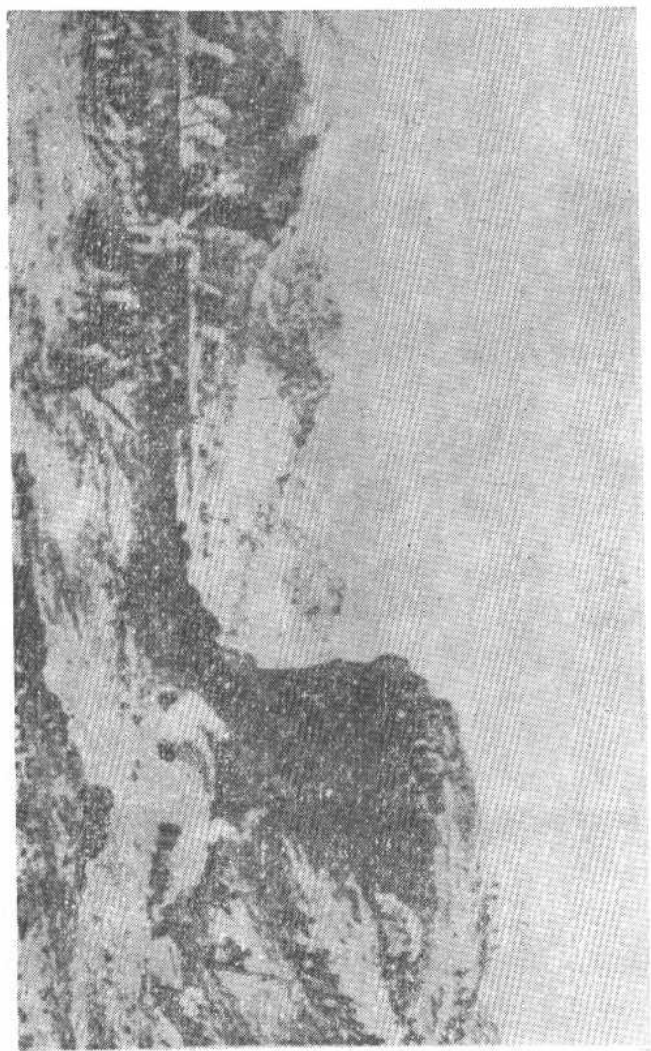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藏品





坚决抗英的闽浙总督邓廷桢（1775—1846）

——江苏省博物馆收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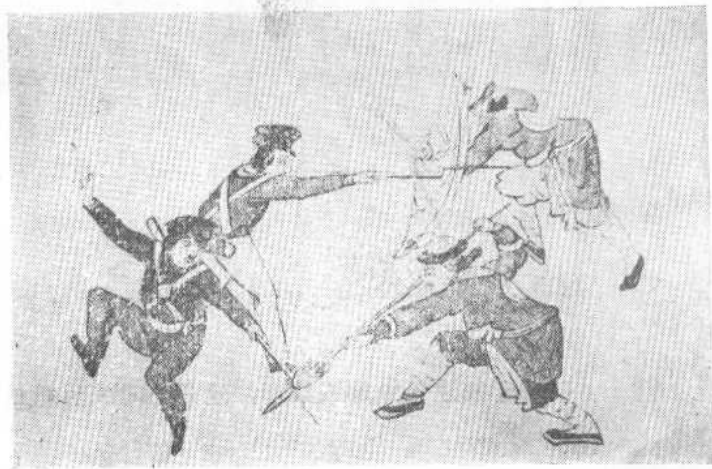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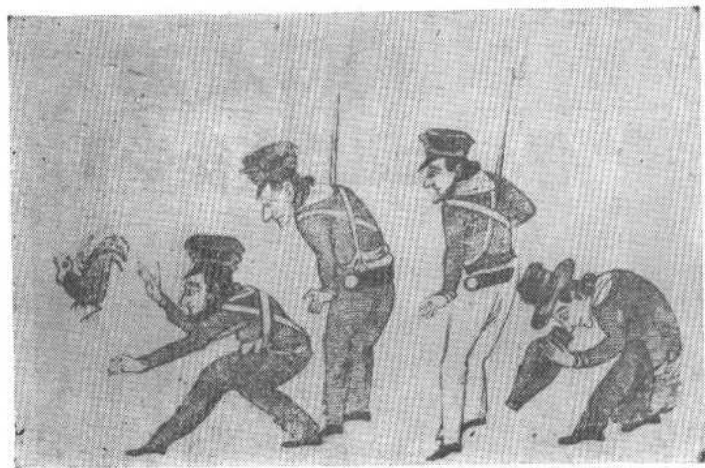


1841年9月，英舰侵袭泉州。

——采自蒲康一：《世界历史大系：东洋近世史第一篇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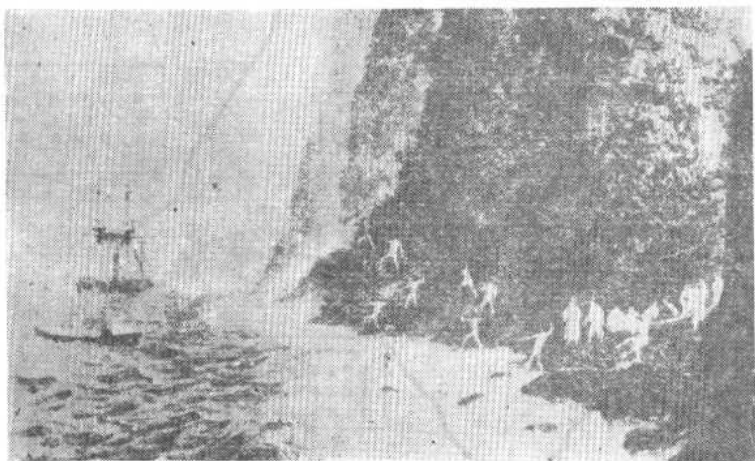
一八四二年英国侵略军掠夺中国人民财物的情景

(见柏纳德：「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」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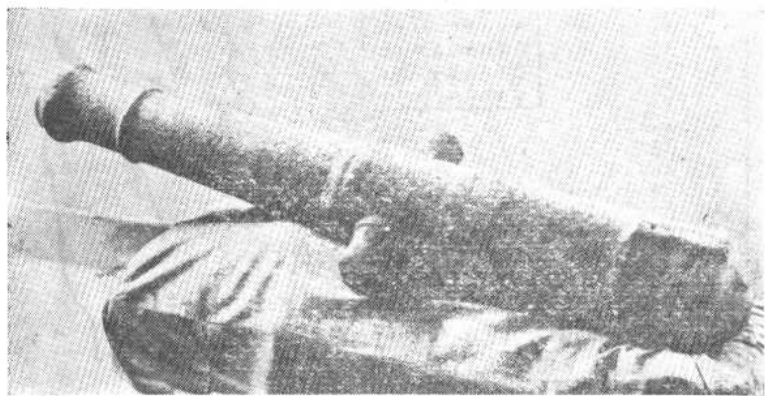
英国侵略军遭受清军抵抗图

(见柏纳德：「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」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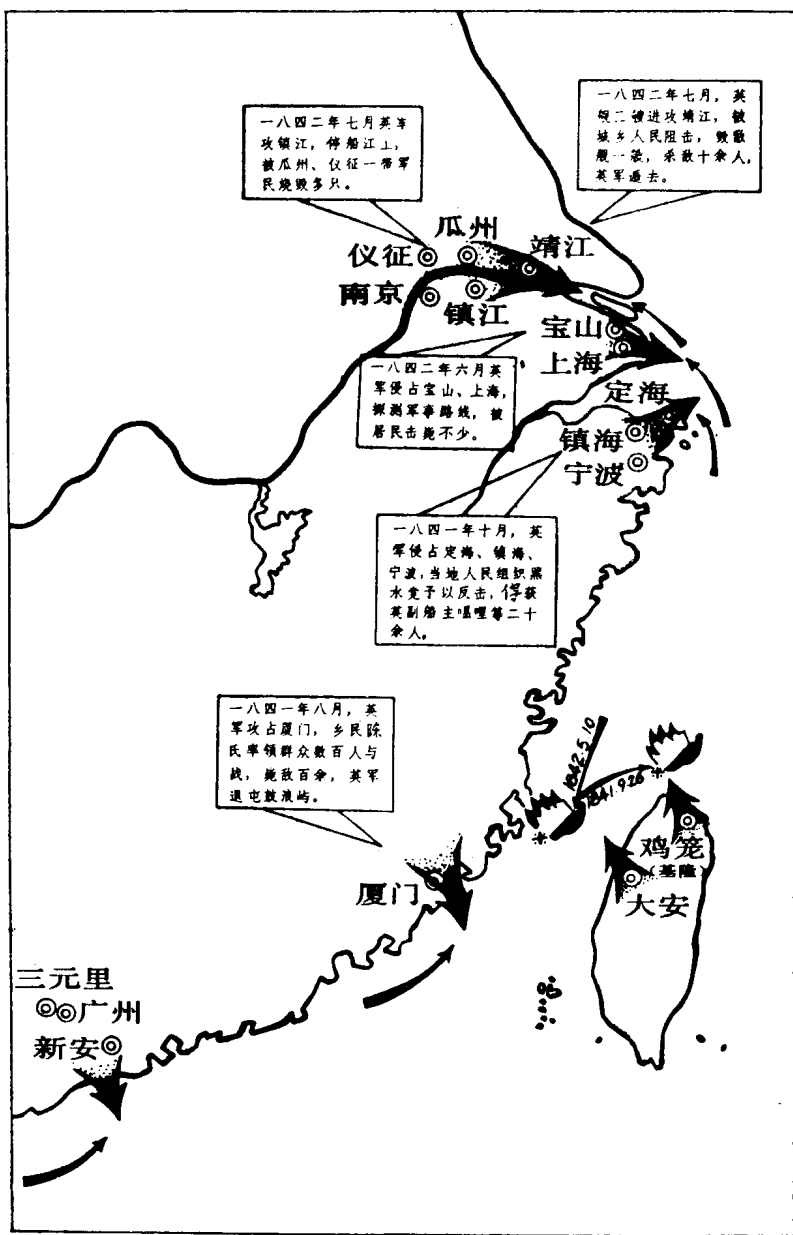
鸦片战争期间，台湾高山族人民抗击英舰入侵。

——上海历史与建设博物馆藏片



在洛阳江中起获的英国铜炮，这是1840年9月英军窜扰福建的物证。

——原炮藏惠安县文化馆



东南沿海人民和台湾军民抵抗英军图

前 言

英国资产阶级为保护非法的鸦片贸易，在一八四〇至四二年向我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战争，这就是有名的鸦片战争。

福建和台湾（当时台湾是福建省的一个府）地处祖国东南沿海，不论是战前英国鸦片贩子的走私贩毒，或者战争期间英军的武装进犯，或是战后英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我国的横行，都曾遭受到严重的祸害。有侵略就有反抗。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，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，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。”^① 鸦片战争时期福建和台湾军民坚决反抗英国侵略的史实，生动地证实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鸦片，作为药物，在公元六、七世纪时已传入中国。中国人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，是西方殖民者大量贩运以后才出现的。英商对华贩毒比葡、西、荷等国商人为迟，但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，他们运来中国的鸦片便急剧增加，很快就成为西方各国对华贩毒的元凶。

英国鸦片流入福建，最初是由福建烟贩自备小舟到澳门购买，十九世纪初，英商开始派船到福建沿海直接兜售。从此“鸦

^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卷二，页六〇二，一九五二年版。

片之流毒，最甚广东，次之莫如福建”，^① 福建成为英商在华贩毒的第二中心。

鸦片大量输入，不但毒害吸食者的身心，使他们变成一具具行尸走肉；而且由于白银大量外流，银日贵，钱日贱，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。鸦片给人民带来了灾难，也造成清政府的财政困难，并使它的统治机构迅速腐败。因此，到道光初年，不但人民迫切要求禁烟，有爱国心的清朝官吏也坚决主张铲除鸦片。

一八三九年，福建候官人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，给他家乡军民极大鼓舞；次年，原在广东与林则徐同心禁烟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奉调督闽，又给福建烟禁以有力推动。从此，福建禁烟迅速走向高潮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一八三九年底至一八四〇年上半年，福建水师先后两次截获大规模“通夷贩烟”的匪船，七次炮击贩毒的英船，都把它们打得狼狈逃遁。

二

正当中国禁烟运动进入高潮，英国鸦片贩子受到沉重打击的时候，英国对华贸易的有关人士加紧策划侵华战争的阴谋活动。他们纷纷上书本国政府，要求“派出足够的海军”，对中国“采取强硬行动”，也就是发动战争；许多人还建议：战争开始后，英军应即占领福建的厦门、福州，可能时还要占领台湾。^② 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三次进攻厦门，五次窜犯台湾，并在订立《南京条约》时坚持在福建同时开放厦门、福建两个口岸的缘由。

^① 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道光朝）卷九，页十一上。

^② 严中平辑译：《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》，见《近代史资料》，一九五八年四期。

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后，英军在七至八月间连续两次进攻厦门。当时，在闽浙总督邓廷桢领导下，军民英勇抵抗，敌人未能得逞。一八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，英军向厦门发动第三次进攻。当天下午一时左右，大队英舰向厦门和鼓浪屿炮台同时猛烈开炮，我军民奋起抵抗，战斗十分激烈，许多官兵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捐躯。但是，由于防兵单薄，下午四时左右，厦门和鼓浪屿的炮台均被英军攻占，第二天，厦门城亦告陷落。

厦门军民第三次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对敌妥协。自一八四〇年七月浙江定海沦陷后，清政府便决定派投降派首领琦善同英军进行和平谈判，把抵抗派领袖林则徐、邓廷桢革职，并命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。因此，在英军第三次进攻厦门之前，厦门新募的八千水勇已遭遣散，而水师提督窦振彪以为“广东甫经议抚，现当无事”，又把一支水师劲旅带往浙江洋面捕盗，致使厦门防务空虚，“屯军仅三千人，水勇亦不越千余人”，^①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。厦门的迅速陷落，同当时闽浙总督颜伯焄指挥失当也有关系。颜伯焄反抗侵略的态度是坚定的，一上任就大力造船铸炮，增募兵勇，积极筹防。但他轻视“邓廷桢之仅仅自守”，不切实际地主张出洋与侵略者追逐，他四处设防，“备多力分”，^②厦门的防御并未得到加强。战斗开始时，他亲自坐镇虎头山指挥，给将士们很大鼓舞，但敌人一占领厦门和鼓浪屿的炮台后，便惊慌失措，不顾部属“宜劝联守，召义勇，飞檄漳泉，协力恢复”的合理建议，^③急忙逃往同安，使英军得以顺利占领厦门。

①林树梅：《从军纪略》，见《敝云诗文集》文钞卷十一。

②《夷艘入寇记》下，见《鸦片战争资料》（六），页一二二至一二三。

③林树梅：《从军纪略》，见《敝云诗文集》文钞卷十一。

英军占领厦门后，大肆烧杀抢掠。虽然侵略者极力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但也不能不承认：“我军（在厦门）得到价值大约二万元的金银条”，①连“一条肥胖的公牛”也不放过，被拉到“复仇神”号船上运走。②

英军的暴行，激起厦门人民无比愤怒。厦门和马巷一带的绅民立即组织团练丁壮一万余人，日夜不停地同敌人展开战斗。本书所载谢兰生《思忠录》的那段记载，生动地说明厦门人民曾给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。正是在厦门人民坚决反击下，一八四一年九月五日，英军才不得不撤出厦门，退到当时还很荒凉的鼓浪屿据守。

如果说，英军对厦门的三次进攻，最后一次曾经一度得逞，那么他们对台湾的五次窜犯，则没有一次不遭到彻底失败。英军第一次进攻台湾的时间在一八四〇年七月，第二、三、四、五次均集中在一八四一年九月至一八四二年五月间，其中以二、四两次进攻败得最惨，共损失兵船两只，大炮二十余门，官兵伤亡和被俘人数共达二百数十人。

台湾孤悬海外，口岸林立，兵力单薄，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呢？这与当时台湾兵备道姚瑩、总兵达洪阿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。姚、达二人都是坚决反抗侵略的爱国官员。他们在战前就与林则徐、邓廷桢一道，一面禁烟，一面认真筹防。战争爆发后，看到台湾人民对侵略者十分仇恨，又“募壮勇以贴防兵”，大力举办团练。到一八四二年三月，台湾团练的乡勇已达四万七千余人，等于额设防兵的三倍多。姚、达不但敢于利用民力，还能认真研究战守，针对英军“船高炮烈”的特点，采取“不与海上争锋，俟其登岸，设伏击之”的战

①滨江：《英军在华作战记》卷二，第五章。

②柏纳德：《“复仇神”号轮船航行作战记》卷二，第二十六章。

略，^①因而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。

三

台湾和厦门抗英斗争胜利的事实说明，只要将官态度坚决，敢于利用民力，军民一致，团结战斗，象当时那样一支海盗式的英军是完全可以打败的。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，不是败于敌人的强大，而是败于清朝最高统治阶层的昏庸腐朽，败于他们对敌的妥协投降。因此，反妥协、反投降是当时爱国军民争取战争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在这方面，福建军民也作过重大努力，有过重要的贡献。

一八四〇年底至一八四一年初，琦善在广州与英军谈判时，事事屈从侵略者的要求，放手卖国。他曾经奏请道光帝准令英人到福建的厦门、福州二处通商。消息传来，福建爱国军民纷纷上禀上疏，反对议和，反对英人来厦门、福州通商，并强烈要求道光帝重新起用抵抗派领袖林则徐和邓廷桢。

一八四一年五月，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战败乞降，与英方订立“广州和约”。但奕山却对道光帝谎报，把战败说成胜利。消息传来，颜伯焘立即上疏揭发，拆穿奕山的骗局。

道光帝对抗英有功的林则徐、邓廷桢无情打击，对败军辱国的奕山和后来在浙江战场惨败的奕经等人，却百般庇护，为之开脱罪责。因此，“南京条约”签订后，全国舆论哗然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道光帝不得不一度下令，将奕山、奕经、文蔚三人革职，定为“监斩候，秋后处决。”但收监未及三月，奕经、文蔚，还有先前锁逮入京的琦善，又一起用了。对此，福建军民十分愤慨。晋江人监察御史陈庆镛以“刑赏失措，无

^①姚莹：《东溪奏稿》卷三，《遵旨筹议复奏》。

以服民”，率先抗议。他还告诫道光帝：“直道犹存，公论可畏”，要求重新考虑对琦善等人的任命。^①陈庆镛的这份奏疏，据说是出于福建爱国诗人张际亮之手。奏疏言人之不敢言，大张正气，给了昏庸的道光皇帝以有力的抨击。

一八四一年底，怡良来闽协同颜伯焘办理军务，不久接替颜伯焘为闽浙总督。怡良在广东巡抚任内，曾同林则徐一道禁烟，抗击英军侵略，来闽后，转而执行妥协投降路线。当时，鼓浪屿仍被英军占据，而英军对台湾的进攻则屡次遭到失败。怡良怕英军“窥台不逞”，再次进攻厦门，两次指示姚莹，要他把台湾的英俘内渡，以便“示德于夷帅”，而“易回鼓浪屿”。^②怡良的要求遭到姚莹、达洪阿严正拒绝。姚、达在报经道光皇帝批准后，还把所获俘虏，除少数“夷酋”外，全部斩决。

“南京条约”签定后，璞鼎查获悉台湾的英俘已被斩决，便说这些俘虏全是英国“遭风难民”，诬告台湾镇道“贪功妄杀”，要求把姚、达“去官正法”，并气势汹汹地威胁：如不照办，“难保无致干戈再起！”^③投降派早就忌妒姚、达的“台湾之功”，侵略者的威胁，给了他们迫害姚、达的借口。于是一时弹章相继，纷纷要求将台湾镇道“解部审办”，以保持“抚局”。道光帝明知这是侵略者“借口报复”，但为保持“抚局”，也命令怡良赴台查办，并指示怡良：“如所奏（指姚、达关于两次擒斩英军的奏报）皆系实情，亦当筹及大局，将达洪阿撤任，带至省城，候旨办理。”^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

①陈庆镛的疏稿，见梁章钜：《浪迹丛谈》卷三。

②夏莹：《台湾之狱》，见《中西纪事》卷十；梁廷丹：《夷氛闻记》卷四。

③《鸦片战争资料》（四），页一八四至一八五。

④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（道光朝）卷六十五，页二十下至二十一。